邵循正說史

邵循正——著

中華書局

1934 年，邵循正在法國留學時攝

1946 年，清華園，邵循正與友人打橋牌
（左起：邵循正、朱自清、吳晗、浦江清）

目　錄

「史德」與「口德」　／ 001

明朝諸帝有蒙古血統這一奇異理論的歷史意義　／ 006

蒙古的名稱和淵源　／ 015

成吉思汗生年問題　／ 024

元世祖朝海都叛亂的背景　／ 036

元代的文學與社會　／ 054

語言與歷史
——附論《馬可波羅遊記》的史料價值　／ 066

祕密會社、宗教和農民戰爭　／ 074

西藏與中原的長期往來　／ 100

太平天國革命後江南的土地關係和階級關係　／ 105

17—18 世紀中越人民在南圻的合作　／ 128

基隆之戰 / 135

法軍之大舉與諒山之失守 / 138

宣光之解圍與鎮南關之陷 / 143

優雅的野心：美國對華提出「門戶開放」 / 147

論盛宣懷 / 164

兩千年來中日人民的友好關係 / 172

附 錄

邵循正先生傳略 張寄謙 / 182

「史德」與「口德」

「史德」不是新的名詞，「口德」更是人們所習聽的字眼。過去似乎還沒有人把兩者聯在一起討論。但是古人所謂「論世尚友」，也許就是我這命題的另一講法。

過去的史學家注重史德，現在的史家更講究史德。研究歷史的目的，是為求真相。從純粹的學術立場來說，史家下一個定論，和科學家定一個公式，方法雖有不同，卻同樣的必須有充分的根據和嚴格的步驟。換言之，根據不完備的材料，或是單取有利於自己的說法的材料，而下肯定的結論，都是有傷史德，和任意譏議他人同樣的有傷口德。至於望文生義及杜撰事實，那就等於信口雌黃，自然不足道了。

現代史學和過去史學有一個顯然易見的區別，那是不必專門研究歷史的人也都知道的。過去的史家都喜歡多作泛論的文字，如「太史公曰」「臣光曰」，和各史上的「論曰」「贊曰」等等，全屬此類文字。至於文集裏面的史論更多，那就紛紛

太史公司馬遷

聚訟，各抒己見，作論的人根據同一的材料，而對一個人的臧否可以大相徑庭。現在的史學家的作品裏，議論似乎遠不及從前的談笑風生了。「論」「贊」一類的文字沒有人做了，他們所描寫的，多是冷酷的事實，他們注意在冷酷史實的行列裏，尋找原因和結果，來解釋一個歷史的現象，他們知道自己的責任不在於替每個歷史上的人物鑄下一個定論，而在於審視主要的事實與過程。所以「論」「贊」一類文字，在他們看起來十之八九都是可笑的議論。

歷史固然是不但「論事」，也要「論人」，然而論人時候仍須以論事為主。舊史家在論事時候，總先存着對人的成見，「論」「贊」一類文字，往往把人先鑒別區分為賢愚臧否，然後討論他行事的是非得失。現代史學中的議論文字，可絕不許如此做了，因為他們都忙着審定討論客觀的事實，他們不敢很籠統地用一兩字或一兩句對歷史上的人物下評語。現在史學家疑古的情緒，也許太高，翻案的文章也許過火，但是至少現在歷

史學者都明白了史學是無窮盡的，結論也都是新陳代謝，自己的結論也未必是定論，就此一點言之，已是近代史事上大大的進步。就此意義而引申之，我們也可以說現代的史學家，對於「史德」也有顯著的貢獻。

所以史學家到了論人論事的時候，他們最注重的是體會當事人的處境，然後討論他們的得失。近來翻案文章也有立論甚正而詞意殊嫌過火的，就是往往不顧環境對於當事人所加的限制。這一類的例子很多，可以使歷史上的人物得到意外的有利評語，或是很唐突的批評。譬如說「王安石是北宋的大政治家，他擬了一個方案來挽救北宋的積弱，可惜他沒有成功」，這句話只說了一半。他的辦法究竟是失敗的，失敗的原因在那裏，做翻案文章的學者們，討論並不使人滿意。固然當時反對他的人極有力量，王安石所引用的一般人也貽誤不少事。我個人看來，比較公平的說法，是王安石所擬的辦法理論上很完美，施行起來卻極困難，引起了許多的騷擾，而得不到預期的結果。他主要的失敗是機構上的不健全，就和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統制辦法的毛病是一樣的，就紙上看，都是好辦法，而結果吃虧的是大家。一個政治家不明情勢，或是沒有工具去克服情勢，那頂多只能算是半個政治家。假如說「北宋之亡，司馬光一般人要負大部分的責任，因為他們阻撓王安石變法」，那自

然是「深文」不足取了。

「深文」就是「故入人罪」，是論人、論世、論事的大忌，不問環境的言論，就不是負責的言論。論近代史，特別是中西剛剛接觸的數十年中，我們假如以新眼光來看那時當政辦外交的人們，我們很可以對其中每個人下一個評語，用舊史論的口吻說：「其愚不可及也。」但是我們應該曉得，當時許多當事人都是絕頂聰明的人，我們生在當時辦那些外交，不見得比他們強，恐怕比他們弄得更糟。所以「史德」，即是「體會處境」，對於讀近代史的人們是極端重要，否則他們的結論，將等於舊史「論」「贊」一樣的籠統無意義。

輿論到了現在，雖然未必已經緊握着政治、社會的管鑰，但它的影響重大，是無疑義。所以輿論界仍然在努力加意，使本身倍加健全。從前有許多報紙是根本不講口德的，現在情形自然改善了極多，這是可慶祝的事情。就是論事，主持編纂今日史料的人，所負責任的重大，至少不下於研究昔日歷史的人們。史學界與輿論界也可說是本來就是一家，所以史事就同樣地注重到史德，我們回顧以往的歷史，不知有多少真正做事的人犧牲在當時的輿論上，或者抑沒在後日之輿論上。我這一段話，也是有所為而發的，我個人和許多朋友，對於近日有些報紙，再接再厲地攻擊冀北電力公司，以貪污的罪狀加在該公司

負責人身上，使我們感覺得異常驚訝。我們深知他們，我們也不願為他們在此多辯護，我們只願負責地說「貪污」兩字對他們是「莫須有」的，我們同樣的感覺停電的痛苦，但是我們對他們的處境困難，知道得更清楚些，所以我們很佩服他們做事的毅力和勇氣。我們希望輿論界冷靜的調查一番，多保全幾個做事的人。我此處離開本題，卻也是一個實例，希望它能說明新史學界和新輿論界一個極密切的關係。

1947 年 7 月 6 日